

【文学】

DOI:10.15986/j.1008-7192.2024.01.012

城市空间与身份建构

——《独腿旅行的人》的空间性解读

赵雪颖¹, 张世胜²

(1. 中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2. 西安外国语大学 欧洲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8)

摘要:《独腿旅行的人》以作者赫塔·米勒的移民经历为创作背景, 主要讲述东欧移民伊莲娜在德国后现代大都市西柏林的城市漫游之旅。移民经历将伊莲娜置于东欧与西欧文化交流碰撞的交界地带, 使其身份具有混杂性的特点。在伊莲娜的城市漫游之旅中, 城市空间不仅是伊莲娜逐步探索的现实领域, 还是其内心世界的直观映射。私人住宅、城市街道、交通场所、公共边界等城市景观隐喻伊莲娜在认知异质文化、经历文化冲突时面临的身份危机。伊莲娜始终在城市的中心与边缘之间游离, 移民身份赋予的边缘性立场使其获得开放包容的认知方式, 将难民营、二手交易市场等边缘地带构建为具有超越性和颠覆性的第三空间。在第三空间之中, 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得以消解, 边缘群体的主体性重新获得关注, 伊莲娜独立自主的主体身份也得以构建。

关键词:《独腿旅行的人》; 城市空间; 第三空间; 身份建构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24)01-0087-06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出生在罗马尼亚一个以德语为通用语言的少数民族村庄。在1987年, 米勒选择同丈夫一道移民至德国, 切身体验到德国与罗马尼亚两国在社会体制、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独腿旅行的人》是米勒移居德国后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刻画了东欧移民伊莲娜在后现代大都市西柏林所面临的文化冲突与身份危机, 其中不乏作家米勒对自身移民经历的艺术重构以及对往日之事的诗意追溯。值得注意的是, 《独腿旅行的人》一书所展现的城市内部空间作为记忆书写的表意场所, 在主人公伊莲娜探索未知世界、寻求文化认同、进行身份构建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20世纪后半叶, 西方学界出现了一场思维方式的伟大变革——空间转向。空间转向颠覆了传统的空间观念, 前所未有地将空间置于和时间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一思维变革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众多学者围绕空间概念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 其中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从马克思思想体系出发, 创造性地对空间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进

行阐释。此外, “第三空间”理论奠基人爱德华·W·索亚则基于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理论, 超越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二元论, 提出涵盖人文地理、哲学思考、文化政治等多维向度的第三空间理论体系。本文根据列斐伏尔和索亚等的空间批评理论, 探寻小说《独腿旅行的人》中城市空间在人物身份构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一、交界地带的边缘人物

作者米勒自小成长于罗马尼亚文化与德意志文化交织的环境之中, 经历着两国在政治文化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巨大差异所带来的冲击。《独腿旅行的人》具有相当的现实指涉性, 主人公伊莲娜便是一个以作家自身为原型所塑造的东欧女性移民的形象。此角色设定将伊莲娜置于东西欧社会碰撞交流的边缘地带, 赋予其身份混杂性的特点。霍米巴巴指出, 现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 没有多少选择, 他们只能居住在一个文化之间的世界, 于矛盾和冲突的传统中创造自己的身份认同; 他们既是此又是彼, 或者既非此又非彼, 深陷文化翻译的动

收稿日期: 2022-02-01

作者简介: 赵雪颖(1997-), 女,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德语文学; 张世胜(1971-), 男, 西安外国语大学欧洲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德语文学研究和翻译。E-mail: zxy111533@163.com

荡与痛苦之中^{[1]34}。伊莲娜的文化混杂身份成为其身份认知危机的外在根源,使她无论在故国还是他乡都无法构建完全统一的身份认同,“一种难以名状的陌生与孤独之感”^{[2]24}贯穿作品始终。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多次提到另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伊莲娜,以隐喻其身份的分裂性、两面性与不确定性。伊莲娜端详着护照相片,她看到“一个熟人,不过跟她自己还不太一样……一个陌生人溜到了伊莲娜的脸上。伊莲娜脸上的陌生气息是另一个伊莲娜的”^{[3]121}。获得护照意味着伊莲娜即将进行身份上的转换,护照相片上的“另一个伊莲娜”是在不久的将来远走他乡的自己,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伊莲娜第一次产生了身份认知危机。可以说,两个伊莲娜在此意义上构成了一对同貌人(源自德语 Doppelgänger,另译为“二重身”“影子人”)。同貌人往往个性迥异,与近乎相同的外表形成鲜明对比。文学作品常使用同貌人母题描述人物身份的多重性和复杂性,隐喻人物的内心挣扎。两个伊莲娜处于无法兼容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环境之中,象征伊莲娜模糊不明的社会身份与自我定位。

从东欧到柏林,伊莲娜体验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但无论是故国的高压统治还是民主德国所谓的民主制度都难以使其在心理上完全产生认同感。一方面,伊莲娜将家乡视作束缚自由的牢笼,这里明令禁止本地居民与外国人接触,伊莲娜为了逃离无孔不入的监视不得不选择移民德国。然而另一方面,后现代大都市西柏林并没能成为东欧小镇的理想替代品^{[4]68},伊莲娜在民主德国仍然难以拥有向往已久的自由。在入境时伊莲娜遭到联邦情报局的百般盘问,不得不忍受德国当局的猜疑。在她眼中这些德国官员与东欧故国的官员别无二致,无论他们身着的西装还是“头部的姿势,侧着的半张脸,有一点朝下,伊莲娜都认得”^{[3]129}。

此外,语言也是构建文化认同感的重要媒介。米勒的文学作品大多以德语作为主要文本语言,但其中往往穿插着匈牙利语、俄语、斯拉夫语和施瓦本语的词汇和短语,德语和罗马尼亚语也不时被拿来比较^{[5]1}。跨语言性不仅体现在文学文本之上,还反映在人物塑造之中。伊莲娜在东欧母国属于少数民族群体,以德语为母语,并能够熟练掌握当地的官方语言。双语能力为其穿梭于两种文化之间提供了前提和保障,同时也构成了充满矛盾的语言认同机制。伊莲娜所熟悉的语言本质上是德语的

区域性变体,因此她在移居柏林之后,与当地人在语言应用上始终存在无法消弭的差异。语言使用习惯的差异构成其融入德国社会的第一道阻碍,使其与当地居民的生活始终保持一定距离,但这也使她能够以理性审慎的态度观察周围的新世界,为随后构建反抗之地的第三空间创造可能。

米勒从后现代女性视角出发,将伊莲娜塑造成一个非传统意义上的女性都市漫游者形象^{[6]217-218}。从一座籍籍无名的海边小镇到现代大都市西柏林,伊莲娜在享受工业社会进步成果的同时,也从一个外来人的视角洞悉资本主义大都市的光怪陆离。消费主义甚嚣尘上、人际关系冷漠疏离、流浪汉们居无定所、难民营中民不聊生,伊莲娜在新环境中洞悉到城市化进程的种种弊病。伊莲娜在城市之旅中遭遇重重挑战、处处碰壁,百般波折的城市经历进一步加深了伊莲娜初到城市的漂泊无依与无所适从。伊莲娜并未沉迷于后现代大都市繁华的城市幻象之中,而是作为一名都市漫游者“充当了现代性的观察者和反表征者”^{[7]79},以敏锐的眼光和批判的姿态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观察。

在伊莲娜的城市漫游之旅中,身份认同危机与她相伴而行。移民群体身上的种族烙印终究无法在他乡的生活中消失殆尽,时刻彰显着他们的与众不同。伊莲娜脸上常常表现出一种“来自东部的笑容”^{[3]220},同属东欧移民群体的两名波兰工人也有着极具东方特色的面庞,“东边人的脸”^{[3]147}成为其身份特殊性的鲜明标识。不仅如此,移民群体的生活习惯特点也尤为引人注目,波兰工人的烟头都“散发出另一个国家的烟味”^{[3]148}。移民群体不仅在外表与生活习惯方面与当地人格格不入,在异国他乡往往成为难以构建文化身份认同感的边缘群体。例如伊莲娜在酒馆偶遇的一名生在瑞士的意大利人,作为第二代移民虽然已经在德国娶妻生子,但他始终感到自己无家可归。与此相似,伊莲娜始终处于一种漂泊无依、居无定所的游离状态,肉体的漂泊无定象征着伊莲娜内心的彷徨不安,她对城市的探寻从而也伴随着身份的构建。伊莲娜对自身身份的混杂性有着清醒的认识,试图在城市空间中形成清晰的身份认知,认为自己“不是身份模糊的天使……只不过是交界地带”^{[3]209}。借助边缘人的身份,伊莲娜在东欧与西欧之间的交界地带试图探索构建一个能够反抗政治压迫与大都市话语霸权的第三空间。

二、城市空间的身份隐喻

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列斐伏尔创造性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空间化阐释,指出空间“产生于有目的的社会实践,是社会关系的产物”^{[8]63}。因此,文学空间不仅具有地理特性,能够充当人物角色活动的背景与平台,在相当程度上隐含着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与人物发展文化认同与构建社会身份的历程密不可分。在《独腿旅行的人》中,伊莲娜作为一名城市漫游者终日游荡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城市空间成为其内心世界的直观映射,在其探寻异质文化、构建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住宅作为城市中私人空间的物质载体,“由于与人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常常成为叙事者用来表征人物形象的‘空间意象’”^{[9]266}。在《独腿旅行的人》中,伊莲娜搬离难民营后的第一个落脚处是一套徒有四壁的居室,该住所的房屋结构和地理位置不仅能够反映主人公的生活状况,还可以发挥隐喻主体身份的表征功能。独立封闭的空房是伊莲娜心理体验的真实写照,深棕色的地板吸走了房顶和四壁的光线,阴暗压抑的房间更增添了内心的不安与惶恐。窗子本起着连通房间内外的作用,但这套居室的窗子并不临街,而是朝向寂静冷清的中庭。由此连接内外空间的唯一渠道便不复存在,使伊莲娜的房间与主流世界完全隔离开来,仿佛繁华喧闹城市中的一座孤岛。封闭孤立的私人空间象征着异乡人伊莲娜在陌生城市的孤独处境,凸显出自我与环境的鲜明差异。随后在中庭竖立起来的脚手架打破了原本的寂静,脚手架发出木板和铁板撞击的噪声持续不断入侵伊莲娜的日常生活。脚手架是城市建筑空间的一个缩影,十层楼高的脚手架赫然耸立在私人住宅之中,隐喻城市经历对伊莲娜内心世界的侵扰。而房间内家具的摆放方式更是加剧了伊莲娜在新环境的无所适从。某个夜晚,伊莲娜在睡梦中从床上掉落到地板上,是因为在故国“伊莲娜的床倚着房间的长墙。在这儿,伊莲娜的床靠着较短的一面墙”^{[3]225}。床在两个国度的不同摆向是东西欧之间巨大差异在空间上的具象化体现,而从床上跌落则意味着伊莲娜初到西欧的手足无措之感。

走出与世隔绝的容身之所,街道是综合展现城

市景观、为主体提供城市经验的重要城市空间。在伊莲娜的眼中,柏林的街道空旷清冷,柏油马路千篇一律,灯光冰冷刺眼,高楼大厦如同闪闪发光的玻璃体、令人头晕目眩。压抑沉闷的城市街道拒人于千里之外,一方面对伊莲娜的个体感知产生了不可磨灭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投射出伊莲娜所面临的冷漠疏离的社会关系。对城市的深入了解并未使伊莲娜萌生家园式的心理认同和文化归属,反而令其陷入充满厌恶与戒备的情绪漩涡。“通过看这些城市,通过她身边的人,她反而远离了城市。”^{[3]243}城市中的一草一木皆是无情,生活在光怪陆离的城市景观之中,城市居民如同在家园中遭受放逐的人群,无法找到精神的真正归宿。此外,餐饮场所作为城市街道的外延空间,是城市中不可或缺的消费地点,在文学作品中往往超越物理层次的含义,成为承载城市主体情感欲望与精神活动的城市意象。酒馆、餐厅、咖啡馆等场所是伊莲娜经常光顾之地,在这些场所她不仅与旧相识的朋友促膝长谈,甚至能够敞开心扉与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把酒言欢。轻松愉快的氛围使得餐饮场所成为都市男女释放情感的绝佳之所,伊莲娜也常常在此填补情感的空虚寂寞。因此餐饮场所作为欲望叙事的载体,不但能够满足城市居民基本的饮食需要,还成为都市人群交往需求和情感诉求的表征空间。

无论是从东欧到西欧,还是从柏林到马堡,旅馆以及机场、地铁站、火车站等公共交通场所都是串联伊莲娜城市漫游之旅的重要节点。但旅馆和公共交通场所仅仅能供旅客临时歇脚,不能长久地充当庇护所。对伊莲娜而言,故国和德国亦是如此,都是人生旅途上无法扎根的歇脚点。伊莲娜始终处于持续不断的运动状态,行走于城市的大街小巷,乘坐地铁、火车、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在城市之间穿行不息。交通工具“本身就是流动的微缩城市空间,承载着城市人的社会空间和城市风貌”^{[10]64}。从故国驶向马堡的火车是连接东欧与西欧的重要枢纽,承载着伊莲娜对德国的美好幻想;政治难民营旁的铁轨将大都市的繁华与衰败并置两端,形成反讽的张力;城市中的地铁昼夜不停,搭载着伊莲娜匆匆前行;万里高空之上的航行时刻隐藏着坠落的风险,如同伊莲娜危机四伏的人生。正如小说的题目所指出的,伊莲娜是一个旅行的人。但是旅行的目的地始终处于缺失的状态,“对伊莲娜来说,上车和下车只是为了不再留在原地”^{[3]143}。无休无止、

漫无目的的城市漫游恰恰映射出伊莲娜缺少方向感和目标性的人生旅途。可以说,伊莲娜的城市漫游之旅也是她找寻自我、构建自我的人生之旅。

随着对城市探索范围的进一步扩展,伊莲娜不断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城市边界。例如难民营中由于施工而搭建的临时围墙,围堵住难民营向上通行的道路;以及难民营所在的死胡同弗洛腾街,有着一眼能够望到边际的尽头。临时围墙和街道尽头不仅作为地理意义上的边界存在于物质空间中,还在社会空间中充当着社会边界的作用,同时在有形和无形之间构成一道阻拦边缘群体向主流社会流动的边界。最具历史意义的城市边界当属极具政治意味的柏林墙,作为冷战期间的标志性建筑,柏林墙象征着两种意识形态之间无法消弭的对立与隔阂。与柏林墙两边的警戒带和边防士兵类似,故国边界上的士兵和雷达伞也是两种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与对抗的具象体现。而伊莲娜就像那片跨越柏林墙的薄云,“从城市的另一头飘过来,越过了另一个国度”^{[3]134}。如云般漂泊无依的伊莲娜行走在东西欧交界的边缘地带,经历着文化和意识形态碰撞带来的挑战。

三、构建主体性的第三空间

索亚在《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中对列斐伏尔、胡克斯、巴巴等人的空间理论进行概括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第三空间理论做出创造性阐释。他指出,第一空间认识论从物质形态对空间进行外部探索;与之相反,第二空间认识论从构想的精神空间中获得观念,并试图将其投射至现实空间中去;第三空间则超越传统二元论的桎梏,对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进行突破性解构和创造性重构,形成一个无所不包、彻底开放的空间。边缘性立场在第三空间理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对中心/边缘二元对立思想的解构与超越。通过重构传统城市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将边缘地带塑造造成一个彻底开放的第三空间。“在这里可以建立反抗与更新的社会,以跨越各种界限并背叛种族、阶级、性别的二元划分以及其他所有不公正的他者化范围”^{[11]106},在二元论中处于下属地位的一方从而获得重构主体性的可能。“事实上,我们发现城市空间改造或说发展的总趋势就是从异质性的生活空间向同质性的构想空间的转型”^{[12]29},而

第三空间则顺势而行,试图消解城市发展的同质化进程,为边缘群体创造生存和发展空间。

“在全球化与现代性背景下,城市文化认同是民族文化认同的进一步发展。”^{[13]118}然而作为移民群体的一员,伊莲娜常常游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不仅无法对德国产生民族文化认同,也无法对资本主义后现代城市文化产生认同。初到柏林的伊莲娜被安置在弗洛腾街的政治难民营中,位于城市生态薄弱地带的难民营呈现出一番与繁华都市有着天壤之别的衰败景象。锈迹斑斑的铁轨、震耳欲聋的噪音、死气沉沉的穷巷陋室无一不宣告着难民营中生存环境的恶劣。在捐赠的衣物堆中,人们寻觅着另一双合脚的鞋子,而“这种从一只鞋到另一只鞋的距离一直都在”^{[3]133},即使移民群体有机会离开难民营,这种两只鞋之间的距离也无法从他们眼中消失。对于伊莲娜而言,两只鞋之间的距离不仅意味着在移民国家仿佛失去希望的未来^{[14]44},还象征着横亘在东欧与西欧、城市的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巨大差异,而难民营则构成了冲突交锋、融合与共存的第三空间。

胡克斯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的序言中讲述了一个“铁轨那边”故事:对于小镇上的美国黑人而言,铁轨就是城市边缘与中心的分界线。他们可以跨越铁轨进入城市中心,为城市中心的主流群体提供服务,但是夜幕降临之后铁轨另一边的棚屋陋室才是他们的栖身之地。弗洛腾街的难民营旁也有一条这样的铁轨,移民们乘着地铁驶向城市中心,最终又归于城市边缘。游离于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生活不仅保证了边缘群体的日常生存,还为伊莲娜提供了一种看待现实的开放姿态——“既从外面往里看,也从里面往外看”^{[15]9},既能看到城市中心,也能看到城市边缘。居于城市中心的主流群体为了巩固自身在中心与边缘二元等级制中的优越地位,往往对城市边缘人群采取选择性忽视的态度。相较而言,伊莲娜的边缘性视域则更具开放性和整体性,突破了以城市中心为出发点的传统思维模式。“选择边缘就是开辟出一个可能的中心来与实际的中心进行对抗”^{[16]404},边缘群体的主体价值由此得到重视与肯定。

此外,二手交易市场作为底层城市人群的重要消费场所,同样成为伊莲娜积极构建主体性,反抗消费主义的第三空间。在这座资本主义大都市中,伊莲娜借助边缘人的身份,审慎地观察到消费主义

发展对人类的深度异化以及后现代大都市所造成的精神危机。随着资本主义在民主德国的迅速发展,资本为了实现自我增值不断刺激公众进行消费,消费主义意识逐渐渗透进民众的日常生活,商品拜物教掩盖并扭曲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商业街,伊莲娜曾憧憬“能多几个身体,可以试穿橱窗里的衣服;再多点钱,能够买得起那些衣服”^{[3]179}。好友托马斯也难逃疯狂消费产生的快感,毫无节制地试穿衣服饰品直到精疲力竭。当商品被赋予额外的社会价值,不仅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发生质变,人也在消费陷阱中逐渐迷失自我。贫穷使得伊莲娜不得不游荡于二手店、跳蚤市场之地,在这里消费主义打造的品牌溢价被充分压缩,商品对身份权力的象征意义也得以弱化,因此二手交易市场不只是底层人民贫困的标识,也可以成为抵制消费主义操纵的第三空间。从这一视角出发,伊莲娜逐渐意识到消费主义对人类内心世界的异化,认识到是“时尚缩短了生命”^{[3]179},对消费主义的态度产生了从迷信盲从到拒之千里的根本性转变。

米勒借助对西柏林都市症候人群的描写,揭示并批判了大都市人群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独腿旅行的人》一书是对集体经验的描写,书中的都市人群并不具有稳定的主体性和主体构建过程^{[17]467}。不仅伊莲娜是一个独腿旅行的人,“她在新环境里遇到的人也都不同程度地生活在没有根基、没有依靠的状态里”^{[2]24}。行尸走肉般的行人、漫无目的的旅客、毫无情感的情侣、冷漠疏远的家人、毫无特点的人物姓名无一不彰显出都市人群的精神危机。横平竖直的城市街道、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整齐划一的居民住宅,构成了井然有序但又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城市景观。抽象单调的城市景观充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无形中麻痹了人类对周围环境的感知能力。“当脑袋停滞的时候,柏油在生长。当柏油停滞时,脑袋里的空虚在滋长。”^{[3]166}伊莲娜意识到属于城市的人“不知不觉地失去了自我”^{[3]234},对此她产生同情、厌恶与恐惧之情,并试图避免城市的恶性影响,不断辗转于各个城市之间便是伊莲娜逃离某一特定城市束缚与影响的重要途径。可以说,伊莲娜始终游离于城市主流群体之外具有客观与主观两个层面的原因。从客观层面来看,精神异化的城市人群缺乏接纳边缘群体的能力;从主观层面来看,伊莲娜主动选择远

离后现代大都市具有操纵性的异己力量,尝试建立自治能力,以寻求心灵的救赎。边缘人物的特殊身份使得伊莲娜未被大都市的生活节奏裹挟,能够采用理性批判的眼光观察城市对人类的异化。

背井离乡踏上城市漫游之旅,伊莲娜在探寻资本主义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找寻自我、构建自我,成功克服文化混杂身份为其带来的身份危机,将位于城市生态薄弱地带的难民营与二手交易场所构建为具有开放视野的第三空间。在这里,伊莲娜以其超前意识打破传统城市中心群体的霸权话语,借助包容开放的认知模式关注城市边缘群体的生存境况。对于消费主义陷阱和城市精神危机的透彻认识让伊莲娜意识到城市主流文化的蒙蔽性与操纵性,成为具有主体意识与自我判断能力的独立个体。

四、结 语

米勒采用一贯的碎片化叙事方式,为读者拼凑出一幅看似灯红酒绿、实则堕落腐朽的资本主义后现代大都市图景。不同种族、阶级、性别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在城市空间中进行碰撞与交流,而边缘群体在资本主义霸权文化的统治下面临生存困境与身份危机。伊莲娜借助边缘群体的混杂身份,穿行于城市的中心与边缘,获取社会主流群体无法得到的整体性观照方式,借此将难民营、二手交易市场等边缘之所转变为反抗之地,开拓成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与可能性的第三空间。在第三空间中,资本主义霸权文化话语得以解构,被压迫者的自我得到重新发掘,由此伊莲娜在混杂身份的基础上成功构建边缘人物的身份主体性。

米勒的特殊人生经历促使其诗学思想和文学实践中渗透着道德层面的思考^{[18]351}。基于自身的移民经历,米勒在《独腿旅行的人》中通过刻画冷战期间东欧移民在德国所面临的文化认同危机与身份构建困境,展现了对移民群体的深切关怀。借由主人公伊莲娜在陌生文化中构建身份的尝试,米勒向来自第三国家的移民群体提供了一种定义自身身份的可能性。移民群体应当充分意识到自身身份的混杂性,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对不同文化进行辩证地审视,既不应被强势文化裹挟,也不应沉浸于原生文化之中墨守成规、故步自封,这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不断加深的当今世界仍然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生安锋. 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D].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 2004.
- [2] 安尼·谷裕.《独腿旅行的人》与对赫塔米勒小说的非政治性阐释[J]. 长江学术, 2011(1): 24-28.
- [3] 赫塔·米勒. 独腿旅行的人[M]//人是世上的大野鸡. 陈民, 安尼,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 [4] MORAY MCGOWAN. 'Stadt und schädel', 'reisende', and 'verlorene': city, self, and survival in Herta Müller's *reisende auf einem Bein*[C]//Haines, Brigid & Marven, Lyn. Herta Müll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64-83.
- [5] CHRISTINA MARKOUDI. Schreiben im hybriden sprachraum: herta müllers „transkulturelle“ texte [J]. Lexis. Athener Zeitschrift für Germanistik, 2021(2): 1-12.
- [6] HANNA ZEHSCHNETZLER. Dimensionen der Heimat bei Herta Müller[M]. Berlin: De Gruyter, 2021.
- [7] 魏建亮. 本雅明笔下的都市漫游者及其“漫游”[J]. 理论月刊, 2014(1): 78-81.
- [8] 李春敏.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探析[J]. 人文杂志, 2011(1): 62-68.
- [9] 龙迪勇. 空间叙事学[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 [10] 徐冠群. 流亡者的城市漫游[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
- [11] 爱德华·W·索亚. 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 陆扬, 等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 [12] 兰凯伦. 空间意识形态与城市边缘地带的生产——以西安“道北”为例[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8(5): 26-31.
- [13] 芦坚强. 城市传记: 城市记忆书写的表意实践[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6(2): 114-120.
- [14] SABINE E. Der raum des fremden als fahrender zug in herta müllers *reisende auf einem Bein*[J]. Zeitschrift für interkulturelle Germanistik, 2016, 7(2): 35-54.
- [15] 贝尔·胡克斯. 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M]. 晓征, 平林,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 [16] 郝娟. 爱德华·苏贾的第三空间理论[J]. 中外文化与文论, 2021(2): 398-408.
- [17] BETTINA BANNASCH, GERHILD ROCHUS. Handbuch der Deutschsprachigen Exilliteratur. Von Heinrich Heine bis Herta Müller[M].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2013.
- [18] MARJA URSIN. Autofiktion bei Herta Müller[C]//Ulrich Breue. Autobiographisches Schreiben in der Deutschsprachigen Gegenwartsliteratur. München: Iudicium, 2006.

Urban Spac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A spatial interpretation of *Reisende auf einem Bein*ZHAO Xue-ying¹, ZHANG Shi-sheng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College of European Studies,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migration experiences of the author Herta Müller, *Reisende auf einem Bein* narrates the urban roaming journey of the eastern European immigrant Irene in the postmodern metropolis of Berlin. The migration experience places Elena on the borders of the collision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Europe thus rendering her identity a mixture of traits. In her journey through the city, the urban space is not only a real world that Irene keeps on exploring, but also an intuitive mapping of her inner world. Private residences, city streets, traffic venues and public areas metaphorically represent the identity crisis with which she is faced when experiencing cultural conflicts. As Irene is always wandering between the center and edges of the city, the marginal stance granted by the migration identity enables her to acquire an open and inclusive cognitive approach to build the edgeland such as the refugee camp and second hand trading market as the third space which are traversable and disruptive. In this space, the cultural hegemony of capitalism is dissolved, the subjectivity of marginalized groups regains attention and Irene's independent and autonomous subject identify is also constructed.

Key words: *Reisende auf einem Bein*; urban space; third space; identity construction

【编辑 王思齐】

刘绍攽《诗经》学阐释思想初探

张煜婧, 冯 阳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5)

摘要:刘绍攽《诗逆志》作为其研究《诗经》的主要著作,其《诗》学以“陶性情,劝善恶”的儒学传统诗教为要旨,中和汉宋二家,旁举博征清人论说,体现出汉宋兼采的审慎态度。同时刘绍攽以训诂音义来疏解文本表义,并以考据史实与探阐义理来挖掘圣人深旨,以文本语境与历史语境的双重考证来深化《诗经》教化育人、移风易俗的社会性功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解《诗》非“汉”即“宋”的偏颇之见。

关键词:刘绍攽;《诗经》学;《诗逆志》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4)01-0093-08

刘绍攽(1707—1778年)是清乾隆时期关中经学大家^{[1]1673-1674},其究心儒学,宗道朱子,著有《四书凝道录》《春秋笔削微旨》《经余集》等书^[2]。《诗逆志》是刘绍攽研究诗经的专著,其书先录《诗经》原文,并随字定音附韵,或录《朱传》,或征《序》说,或引前代名家论解,而切究其取舍汉宋二家的准绳,则唯“圣人垂戒”为旨归。刘绍攽对汉宋二家论《诗》阐释皆有驳正,体现出其兼融汇通、博采诸家的学术倾向。同时,他在承认汉《序》不可尽废的前提下,将《春秋》与《诗》并举,不仅从经学地位上将二者划等,也用《春秋》史实丰富了《诗》的世次背景,实现了文内之意与文外之事的三重考证。

一、以“圣人垂戒”为基础

从《四书凝道录》对《论语》的集注来看,刘绍攽认同孔子对《诗经》进行了刊定与正乐。《论语序说》中,刘绍攽引《史记·孔子世家》中“删《诗》正乐”一句后,注有“有语大师及‘乐正’之语”^{[3]85},前者指《八佾》中孔子与鲁大师语乐,后者指孔子自述其返鲁后《雅》《颂》正位,二者皆可作为孔子正乐的佐证。论及“《诗》三百”时,刘绍攽以“季札观乐”之篇章与今传本无异,故而引朱子言以为孔子仅作“刊定”^{[3]92}。但又有对“兴于诗”的注解,刘绍攽以

“后夔典乐而教胄子,其曰:‘《诗》言志。’”为例,认为唐虞时已有《诗》,因“未经删定”才断绝不传,故赞孔子有赅续绝学之功^{[3]172}。对《史记》《汉书》所载孔子删诗之说,刘绍攽的态度仍有些模糊,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认同今本《诗经》是经过圣人手泽予以刊定、编次与正乐。因此在刘绍攽看来,《诗经》经过孔子的经典化处理后,本身就具有体现“诗人之意”的浅层诗意与“圣人之志”的深层义旨。

在阐释诗旨时,刘绍攽也注意到了“诗人之意”与“圣人之志”,在《诗逆志》中屡屡提及“诗人”“圣人”“夫子”等语,如《召南·鹊巢》比于《樛木》之义,故“诗人美之”^{[4]13};《邶风·柏舟》有“圣人忧之……特录篇首”;《唐风·采芣》有“夫子录此以为后世信谗言之大戒”。刘绍攽在提及“诗人”时着眼诗歌文本,或考察辞气情感与比兴文法,或由文本推阐“美刺”倾向;提及“圣人”“夫子”时,则多在“刺诗”,以明圣人存删重在垂戒昭示后人。“诗人之意”可以通过训诂、注疏以及反复吟咏等手段来理解体会,而“圣人之志”则需“以意逆志”,在对理解表层文本的基础上,以己意逆溯圣人本志。刘绍攽正是以“圣人垂戒”的教化作用作为解《诗》基础,结合训诂与义理来逆溯“圣人之志”,最终实现“陶性情,劝善恶”^{[5]260}的诗学理想。如刘绍攽解《邶风·

收稿日期:2023-06-14

基金项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2022年度《关学文献整理续编》重大课题“刘绍攽经学诠释著述整理与研究”(2022HZ1563)

作者简介:张煜婧(1999-),女,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冯 阳(1976-),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E-mail: 594987310@qq.com

桑中》为“淫者自作”,认为“夫子列于《墙茨》《鹑奔》之间,《定中》再造之前,亦犹商臣、蔡般之在简”,可见他认同《诗》有善恶,善者可劝,恶者可戒。“所谓思无邪,而可以兴者”,刘绍攽认为学《诗》有次序,而“兴”在学《诗》之序首,故曰“学始于兴起善心”^{[3]283}。因此不难追溯出他解《诗》的理论路径:以兴发读者“善心”为学《诗》之始,继而承认《诗》有雅郑善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6]53},则是“诗可以兴”的表现。圣人存恶者,是为垂戒后人,正如“商臣、蔡般之在简”。

同时刘绍攽还引入了“义”“义味”“意味”的概念,来衡量诗歌化俗育人的功效是否能够引起读者回味、留续的心理状态。如刘绍攽引李光地言解《周南·芣苢》为“文王求才之殷,取才之尽”,作诗者以“芣苢”起兴,正如《关雎》“荇菜”之义。《薛君章句》解为“诗人伤其君子有恶疾”“发愤而作”,芣苢在这里成为了象征君子恶疾的恶草,“君子有恶疾,我犹守而不离去”替代了对文王求贤若渴的美意。在此解中,作诗者兼任诗歌赞美对象与创作主体两种身份,诗歌所指涉的对象也模糊化为身有恶疾的“君子”,因此刘绍攽认为此解“义味甚浅”。《唐风·山有枢》一诗,朱熹认为此诗答前篇《蟋蟀》“及时行乐”之意^{[7]79},刘绍攽则批评此乃“庄周放达之言”“圣人奚取”。许伯政就《序》义而推衍,解为“晋人忧昭公之孤立,将亡而作此以刺之”,表层含义是劝君及时取乐,否则将为“他人是愉”;深层含义是国人忧其君孤立无助,亡国之后,“是物也行且为他人所有”,刘绍攽赞为“意味深长”。可见刘绍攽所谓“义味”也就是透过诗歌的表层含义,挖掘出诗歌的深层含义来达到实现诗教化人的目的。

刘绍攽解《诗》重视“圣人垂戒”的化俗育人之效,故而不尽认同朱熹的“淫诗说”:“《集传》谓‘淫诗’,何淫者之多?即云‘垂戒’,得一二而已,足何至连篇累牍,不几于导欲乎?”他虽肯定《诗》分雅郑善恶,但若经圣人手泽予以删定,则不会令《诗经》存有太多的“淫诗”,使之有雅郑颠倒、喧宾夺主之嫌。而朱熹所判定的“淫诗”数量过多,以至于反有“导欲”之嫌。在朱熹所定的“淫诗”中,刘绍攽仅认为《邶风·桑中》与《郑风·出其东门》两首属于朱熹所界定的“淫诗”范畴。如《出其东门》,刘绍攽认为《序》所言“闵乱”^{[8]370}之“乱”当为“淫乱”之

“乱”,并评价朱子解为“能自好而不为习俗所移”“得风人之正解”。故而刘绍攽并未全盘否认“淫诗”的存在,只是在淫诗的数量上与朱熹不同,认为“淫诗”过多,不仅不会起到垂戒昭示后人的教化之用,反而会令人怀疑圣人存“淫诗”之多的用意。

刘绍攽重视“圣人垂戒”的诗教论,视《诗经》为“言理之书”,屡次提及《诗》之为经的化俗育人的功用。仅仅从字句义疏上锱铢必较的“《序》与朱传之争”是末节之事^{[5]331},于刘绍攽更为重视的诗教无益。故而刘绍攽在解《诗》过程中既无意固守一家,亦无意调停汉宋门户之争,而是从文意、情事与义理进行论说与考证,以化俗育人的诗教为准则,择汉、宋二解圆融通畅者从之,窒而迂谬者不从。

二、对汉宋《诗经》学阐释的驳正

刘绍攽对《诗》之义旨的阐释以“陶性情,劝善恶”的诗教作为宗旨,对汉宋《诗经》学阐释的接受呈现出中和、并举的兼容态度。通过探研其对“思无邪”的接受与“郑声淫”的解读差异,可以溯源他对汉宋二家解《诗》阐释理论进行驳谬与补正的理论基础。

1. 对“思无邪”吕朱之争的辨析与取舍

吕祖谦、朱熹二人围绕“淫诗说”多有争论,其争论原因之一是吕、朱二人对“思无邪”之“思”的主体判定不同。吕祖谦认为“思无邪”之思既指作诗者之思,也指读诗者之思,“诗人以无邪之思作之,学者亦以无邪之思观之”^{[9]8}。朱熹则认为“思无邪”是对读诗者的要求,无论作诗者之思“无邪”与否,只要读诗者以无邪之思观之,亦足以“为吾之警惕惩创之资”^{[10]3371}。这将诗教的应用范围扩大到了“有邪”之诗,深化了诗教化人之用。

刘绍攽在《雅郑说》中提及吕、朱论争时,盛赞朱子之论“独得删诗之旨”,而其论能凌驾毛郑,在于朱子是从读者角度理解“思无邪”,即“诗之为教,使人如此,非必其言粹然一出于正”^{[5]345}。所谓“思无邪”,是指受诗教之化的读者其思“无邪”,非指圣人所存之诗纯然出于雅正。但接受了朱子对“思无邪”的阐释之后,刘绍攽在《诗逆志》中并没有一以贯之,往往对朱熹斥为“淫奔”之诗驳而不从。在

《魏晋诗论》中,刘绍攸强调诗歌具有“陶性情,劝善恶”的功化,并引朱子“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足以惩创人之逸志”为“说诗之正”,认为这才“合于‘思无邪’之旨”。可见刘绍攸对朱熹“思无邪”诠释的继承,在于“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6]53},更侧重于强调“诗之为教”感风化俗之用。而朱熹对“思无邪”的阐释,更强调《诗》分雅郑,“非必其言粹然一出于正”。若“非以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也”^{[10]3371},则可摒弃小《序》的桎梏,从文本出发体濡吟咏,屡作新解。

由于刘绍攸对朱熹“思无邪”阐释的接受出现了接受侧重点的不同,其解《诗》沿着诗教功用的传统方向发展;而朱熹则从诗有“雅郑”出发,翻旧立新。这使得刘、朱二人在“淫诗说”上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同时由于二者对“思无邪”认知接受之间的差异,使得他们在对《诗经》另一个本体问题的认知上也出现了较大的区别。

2. 对“郑声淫”的解读

刘绍攸在《九畹古文》中《雅郑说》述评吕、朱之争时,还涉及到了有关“声淫”与“诗淫”的问题。刘绍攸在此篇中尊朱反吕,认为声与诗通,“未有诗不淫而声淫者”^{[5]345}。但在阐释《诗》旨的具体过程中,刘绍攸的思想却发生了截然的变化:在郑风结语中,刘绍攸引李光地之言认为“声与诗不可不辨”。

《九畹古文》成书于乾隆六年(1741年),《雅郑说》辑录于该书卷六,该卷多为独立成篇的专题说理文。《诗逆志》成书时间尚未勘明,现存有陕西省图书馆藏稿本与三原县图书馆藏稿本两种版本。前者为初稿,后者在初稿上有所涂改增补。据省图所藏版本中载《郑风·女曰鸡鸣》中,刘绍攸提及乾隆庚午年(1750年)与睢州蒋蔚论《诗》一事,可知《诗逆志》的成书时间应不早于1750年。因此《雅郑说》很可能创作于刘绍攸《诗》学研究的早期阶段,《诗逆志》应在此之后。

从《九畹古文·雅郑说》中认为“郑声”即“郑风”,再到《诗逆志》中认为声诗须辨,故而刘绍攸对朱熹的“淫诗说”大多驳而不从。刘绍攸虽未明言他思想转变的缘由,但从他对郑风的结语中或可窥见一二蛛丝马迹。

杨升庵曰:郑声淫。淫者,声之过也。水

溢于平曰淫水,雨过于节曰淫雨,声溢于声曰淫声,一也,非谓郑诗皆淫也。李厚庵曰:声与诗亦有不可不辨者。论其合,则自言志,至于和声一也,故曰闻其乐而知其德,未有本末乖离者。论其分,则诗直述情事而乐被以音容,故兴于诗,成于乐。郑诗可存也,而郑声必放。以为述情事者,人能辨其非。饰之音容,则惑焉者众矣。

此段涉及到“郑声淫”解读差异的两个关键之处,一是对“淫”字的解释;二是“郑声”是否完全指向“郑风”,或是指“郑风”的部分而言。而正是对这两个关键点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刘绍攸对《溱洧》的解读在不同的篇章中呈现出了彼此矛盾的态势。

(1)“淫”的含义。朱熹在《诗集传》中虽未对“郑声淫”之“淫”作直接解释,但从他在《诗集传》中对“郑风”的价值评价来看,朱熹将“淫”字解为男女间不合礼法的关系。

从《说文解字》和《尔雅》的解释来看,“淫”字原义与“邪秽”无涉,反有“过度”“过分”之义。这一层含义的使用在先秦典籍中较为常见,如与“郑声淫”同出一典,语境更为类似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1]42},虽然“淫”字在此用以修饰情感而非音乐,但其前加上一个否定词来体现儒家“雅正中和”“温柔敦厚”的乐教,其本身就指涉了“淫”之原义。在原文中,被孔子斥为“淫”的郑声,与“佞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放逐了“淫”的郑声,则“佞人”也会岌岌可危。因此“淫”与“佞人”在某一语义层面上是相通的。朱熹解“佞人”为“卑谄辩给之人”,刘绍攸引范祖禹注“利在君父则从君父,利在权臣则从权臣,利在敌国则从敌国”^{[3]263},从“君父”“权臣”“敌国”等词来看,佞人之“卑谄辩给”应当指涉君臣关系的国家层面,而不仅仅只在男女关系的家庭层面。故而以“淫”解为男女交往不合礼,误之甚明。而孔子之所以会提到“郑声淫”,不仅是在颜渊问及“为邦”之后,并连举夏殷周等古盛世,还提到了“尽善尽美”的“韶舞”,明显与下文犯“淫”的“郑声”有反对之义。

刘绍攸引杨慎《丹铅录》将“淫”释为“过”,“郑声淫”是指“郑声”之“过”,即郑声不符合诸如“韶舞”等正乐中和雅正的标准。这是对音乐形式的批评,而不是对诗旨内容的价值判断,因此自然与《诗

经》中的“郑风”无涉。这样的解释则更为贴合孔子论“为邦”的语境。

(2)“郑声淫”与“郑诗淫”的声、诗之辨。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亟言须放的“郑声”并不能指向《诗经》中的“郑风”,这一点学界已有明确的表述了。将“郑声”还原到《论语》的原始语境中去,不难发现孔子每举“郑声”,辄置其于“韶舞”“雅乐”等正乐的对立面。刘绍攽还引史实来旁证上古时期《诗》“皆能成歌”:“东汉末,雅乐郎……只记习《鹿鸣》《驺虞》《伐檀》《文王》四篇,余声不传。太和末又失其三,至晋室而《鹿鸣》又无传”,只是“今则诗存而声失矣”^{[3]263}。可见“声”与“诗”当分而论之。

明确了声诗须辨后,刘绍攽所引李光地之言讨论了声与诗合、离两种情况。声与诗合时,则如《雅》《颂》,诗与声皆表一志,故“闻其乐而知其德”。而当声与诗各表之志背离时,则需存诗放声。“以为述情事者,人能辨其非;饰之音容,则惑焉者众矣”,存诗,尚可从所述之事中据情理来分辨是非;存声,则会被乐声所迷惑,反而达不到以《诗》育人化俗的目的了。

古人认为声音具有“乐淫坏性”的感化情性之用。如《乐记》载魏文侯对古、新乐不同的态度:闻古乐则“恐卧”;听新乐便“不知倦”。作为新乐代表的郑声,“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12]492},比之古乐更易让人“流湎以忘本”^{[12]485}。而再追溯到“淫声”诞生之初,即是为“好酒淫乐,嬖于妇人”^{[13]50},自然会从节奏、五音、曲调等方面极尽能事,其感人溺志之能远非纯为礼乐制度服务的庄重、雍和的古乐所能及,因此圣人才亟放“郑声”。古人之所以对新乐如此警惕,还有“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14]354}的原因。“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15]328},乐如能疏、镇性情之秽、浮,自然也能导秽激浮。乐之为教,当慎之又慎,“故先王谨为之文”^{[13]354}。同时刘绍攽也注意到了声与诗在教育育人上的不同,并引朱子之言予以解答:“声入于耳、感于心,则不可以无放。若夫考其俗以究治乱之本,极其弊以察是非之心,诗可不存乎?”^{[3]99}

从“淫”之含义与“郑声”的指涉对象两个关键点的解读差异,刘绍攽完成了对以“郑声淫”曲解之意为理论基石的“淫诗说”的质疑。刘绍攽虽在《凡例》中力陈汉儒解诗之弊,但他亦不遵从朱子

辟《序》而据己意的解诗思路,而是以对“淫诗说”的质疑为起点,以圣人垂戒、诗教化人为基础,所解之诗旨内容又复归到了尊奉小《序》的汉儒解诗框架中。

3. 小《序》之存废

刘绍攽在《凡例》中梳理了古《序》见疑始末与汉儒解《诗》多谬,并举陈澧注《礼记》为“千古穷经之要”:“名物度数据注疏,道学正论宗程朱,精义详尽则泛取诸家,发明未备则足以己意。”从“据注疏”“宗程朱”来看,刘绍攽十分重视前学,不会轻易改弦易辙。他在《陈风·墓门》的解读中认为:“况陈事既无他籍可考,而此诗业有古《序》可据,则诸儒之从《序》说,似不必致疑于千载之下。”对于仅有古《序》可依的诗歌,若尽废古《序》,则会使解诗漫无根据,无枝可依。因此刘绍攽认为遵《序》是相对妥帖的解诗方法,这也是他选择修正而非推翻《序》说的原因。刘绍攽还指出朱熹解诗是“以论文之法论诗”,即“凡诗中非有人名事迹可考者,多以为无据”,遂举“赠人”之诗所借用的典故亦“未有直指其人”为例驳之。从诗文异体的角度论述小《序》不可尽废,其仍有可供参考“某事某人”之用,这体现出刘绍攽对小《序》存废的谨慎态度。

刘绍攽虽认为汉儒解诗鄙陋失真,但又认为小《序》去圣未远,比之今人凭己意妄加揣测,不如择其理通义融者从之;与情事世理不合者,再据理予以修正。因此刘绍攽多在细节对汉《序》进行修正,以使其更加圆融通畅,大体路径仍是沿着汉人步履,往往不会如朱熹近乎背离地辟《序》而论。如《序》解《郑风·狡童》为“刺忽”。但若以“狡童”为郑昭公,则不符合为尊者讳的“谏谏”传统。刘绍攽引严粲之说解“狡童”为“忽所用之人”,解“子”为“忽”,这样就在不破《序》解的前提下化解了直刺君王的不妥之处,“足显诗人忠爱之心而不失君臣之分”。或去疑不取,大义仍从《序》,如《序》解《周南·葛覃》作于“后妃在父母家”时,刘绍攽虽质疑“岂有未嫁而预筹归宁之理”,但大义上仍遵从《序》美妇道之勤。或补明背景,以使诗义更加丰富,如《序》与朱传均只点出《周南·兔置》有“后妃之化”“化行俗美”,刘绍攽引李光地言指明其为贤人登用之后追述王朝草创之初,此则愈见“文王立贤无方”。

三、文内之意与文外之事的双重考证

“善说诗者,莫如孔门言‘切磋’则进于贫富,言‘素绚’则义通于礼后”^{[5]332},刘绍攸认为《诗经》义旨不只在在于其文本所表述的浅层含义,而需“诣进”“义通”的进一步生发。也就是说,刘绍攸认为《诗经》存在着待挖掘的深层义旨,而深层义旨才是诗教发挥作用的源头。刺、淫之论众说纷纭,追其本原即为是否联系《诗》之本事。正如刘绍攸所言诗这一文体决定了文中“未有直指其人者”,《诗经》的浅层文本所蕴含的信息量不足以逆溯本志,则需借助小《序》《春秋》等外部文本的信息来填补《诗经》表层文本遗留的空白。马端临也就此有论:“盖尝论之,均一劳苦之辞也,出于叙情闵劳者之口则为正雅,而出于困役伤财者之口则为变风也;均一淫佚之词也,出于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于刺奔者之口则可录也;均一爱戴之辞也,出于爱叔段、桓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于刺郑庄、晋昭者之口则可录也。”^{[16]1540}诗歌内容不变,叙述主体和本事史实不同会使得诗歌的价值取向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诗之删录。如若不援引外部文本的语境,单单从诗歌的表层文本中则难以探明叙述主体和本事史实。

刘绍攸解《诗》亦可远溯孟子。其书名《诗逆志》即从“以意逆志”^{[17]454}化用而来,刘绍攸解《诗》以此为大旨,穷理之后再以己意迎取圣人之意志。孟子谈《诗》又有“《诗》亡然后《春秋》作”^{[17]398},刘绍攸据此认为“《诗》与《春秋》义通”。不引据《春秋》,则如“矮人观场,莫知其悲笑之所自”^{[3]474}。由于不清《诗》之世次与本事而蔽障视野,则难以实现“以意逆志”的溯意路径,圣人之义旨更不足发明复彰。

受孔孟《诗》学的影响,刘绍攸不仅从辞气、文意和次序等方面切究《诗经》的表层文本,还斟酌诗《序》、旁引《春秋》,力图挖掘出《诗经》潜藏的深层义旨,从而形成对《诗经》文内之意与文外之事的三重考证,以实现诗教化育之用。

1. 文内之意

在强调“《诗》固言理之书”时,刘绍攸也注意到了诗歌这一文体能通过“声律”“管弦”等文学特质

感人心志、摇动性情,达到宣发理言的目的。他指出《诗》“舍理而何以为性情”,换言之,舍“性情”而何以为“理”。《诗经》“不似他经之庄言”^{[5]331},具有情与理不可偏废的特性。文本作为联结“性情”与“理”的唯一中介,通过“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7]2}的体认方式,从而实现对深层诗旨的逆向追溯,这也是刘绍攸在具体解诗过程中反复切究“词意”“文意”“辞气”等表层文本的原因。如对《东门之池》和《东门之杨》两首诗,刘绍攸都通过“玩”其词意,即反复吟咏、体濡来领会文本含义,体察到其“无褻狎谑浪”“淫昵褻狎”之意,从而否认了朱子“淫诗”之说。《东门之杨》旧解“男子亲迎而女不至”,刘绍攸又据《仪礼·士昏礼》认为“婿与女相离不远,岂有迎而不至之事”,遂从许伯政以为“迎之者迟,其咎在男”,从辞气与情理两方面予以考证,使得诗解更加圆融无缺。

刘绍攸不仅批评王承烈以《召南·野有死麇》为“变风之错简”的说法有“改经之僭”,同时他还将二南诗旨互相比附:“《鹊巢》至《采蘋》,比之《关雎》至《螽斯》之义也;《甘棠》至《何彼襛矣》,比之《桃夭》至《汝坟》之义也;《驺虞》,则《关雎》之义。”依照诗歌的编次顺序,数篇诗歌间形成了多个可互相参见的诗意群。可见,刘绍攸不仅认为《诗》之次序不可变更,还可以根据前后诗篇所形成的诗意群为推衍诗意作参考。《郑风·将仲子》序于郑风下第二首,朱熹解为“淫奔者之辞”,刘绍攸则认为“国风之例,多以关于君、卿、大夫者居前,民俗居后,若淫奔之诗不应次此”。且《将仲子》之后的《叔于田》《大叔于田》二首,朱子又从《序》说,刘绍攸据三首诗编序相次,认为“其一时事也”。正如刘绍攸在王风结语中提到:“《节南山》以下作自卿大夫者曰‘雅’,《黍离》以下畿内民俗曰‘风’。”刘绍攸认同“风”之诗歌内容虽反映国内民风民俗,但也应该是按照君、卿、大夫、民的顺序来编次,不可随意颠倒。

刘绍攸还总括了另一类层层递进的诗意群:“首三篇,俭不中礼;《十畝》《伐檀》而天地闭,贤人隐;《硕鼠》而百姓畔之。”魏风前三篇《葛屨》《汾沮洳》《园有桃》是从礼教上刺“其俗俭嗇”;《十畝》《伐檀》之刺则已触及民生层面,前者“刺时”,后者“刺贪”;而《硕鼠》则是苦怨沸腾的生民心声,直言“逝将去汝”。故而刘认为魏风刺意随着次序逐渐

加深,可证诗歌的义旨与次序有着某种正向的联系。在解读《陈风·东门之池》时,刘绍攽引李光地之言认为此诗之义旨“与前篇相类”,皆有“惜其愿而无立志”之意,指出了前后诗篇之义有互相参照的可能性。又如《齐风·甫田》一诗,《序》与朱子在所刺之人上有所出入,而刘绍攽认为此诗确为“刺襄公”,除了引《春秋》史实旁证外,还联系了此诗“恰在《南山》《敝笱》之间”的次序。朱熹与《序》皆解《南山》为“刺襄公”,《敝笱》一诗,《序》解为“桓公不能制其妻”,朱子解为“庄公不能制其母”,虽所刺之人不同,但所刺之事相同。《甫田》既在此二诗之间,同一诗意群内义旨趋向一致,则“其为刺襄公无疑也”。

2. 文外之事

刘绍攽既认为《诗经》中存在有待探究的深层义旨,而对其义旨的探究若只停留在章句,抛开世次本事不仅难以追溯语义根本,而且还易因语词指义不明陷入汉宋训诂的微末之争。而小《序》《春秋》能为诗歌中模糊的叙述主体与创作背景提供旁证,使得挖掘诗歌深层义旨成为可能。刘绍攽还认为《诗经》与《春秋》“同一义”,二者都属暗含“予夺褒贬之书”。《春秋》之“予”在于“楚取彭城”“尚系之宋”,“楚灭陈”后“犹书陈灾”;“夺”在于吴楚僭号仍书“子”不书“王”。《诗经》亦然,如《绿衣》《新台》皆为卫事,但“仍其旧号”,此“予”也;唐、魏为晋灭,削晋而存唐、魏,此“夺”也。而吴、楚削而不存,非其“文采”不足以“采风”,乃合乎“笔削之旨”^{[5]332}。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刘绍攽则进一步称“《诗》不亡,则《春秋》不作”“以《春秋》继《诗》”^{[5]298},《春秋》在垂戒昭示后人的义理层次上能接续《诗经》义旨,二者可以参照互见,故《春秋》足以发明《诗经》之晦言。

《郑风》中有《东门之墀》一首,《序》与朱二解皆有刺郑无礼教之意。除此之外,《郑风》剩下的二十篇诗歌中,朱熹认定的“淫诗”就有十三首^①。除《出其东门》外,刘绍攽皆从《序》不从朱。若依遵朱子“淫诗”之论,十四首“淫诗”几乎占据郑风一半又多,而事涉郑国统治阶级的刺诗仅有三首^②,则郑俗淫乱当为首弊。刘绍攽以《春秋》书“天子之事”,而《诗》既与《春秋》义通,其存善者以垂范,存恶者以垂戒。若重陈郑俗之淫乱而微刺庄公、叔段等不君不臣之事,则不仅与《春秋》书“天子之事”相悖,还

令《诗经》反有“乃欲止淫”“先以导欲”之嫌。同时《春秋》“赋诗言志”的现象,也能为解诗之义旨提供解读方向。如刘绍攽引《左传》襄二十六年子展赋《将仲子》为例,其为“取兄弟相护之意”,而无淫邪之思。春秋时期士卿大夫赋诗言志,虽多为“断章取义,余取所求”^{[18]1440},其语义与语境都会随赋诗者的“求取”发生变化,但可以肯定的是士卿大夫在正式的外交场合不会赋“淫诗”,如伯有就因赋刺公子顽烝父妾的《鹑之贄贄》遭赵孟贬斥。伯有虽断取“人之无良”之义,但因诗义仍涉“床第之言”,故“非使人之所得闻”^{[18]1418}。据《左传》昭十六年载宣子请郑六卿赋诗言志,所赋之诗中《野有蔓草》《褰裳》《风雨》《有女同车》《蓀兮》五首皆被朱子断为“淫诗”,宣子却未曾斥之一语。即便是“刺淫”之诗都在外交场合中赋诵即遭贬斥,更何况是被朱子目为“淫者自作”的《野有蔓草》诸诗。戴震也认为“不可以邪僻之言加之君子,鄙褻之事诵之朝廷,接之宾客”^{[19]9}。《诗》与《春秋》同一义,不仅可援引史实证《诗》有其本事,同时也佐证了《诗》中亦有“褒贬行其间”,从而匡正了朱熹废《序》无据之弊;赋诗言志不赋“淫诗”,则是驳倒了朱熹将郑风中十四首诗定为“淫诗”之举。

从教化效用来讲,朱子因废序而无旁证可考见诗之世次本事,只能求诸语辞句义,故而得出的“淫奔之诗”“淫女之辞”等结论仍停留在《诗经》文本的表层含义,而未涉及圣人存诗“本旨”。所谓“五常之际,本自相通”^{[19]9},诗中朋友、兄弟、夫妇之情可以用以比附君臣之义,“好逑淑女”的君子也可以比附好贤,而诗教之重在后者的比附义,不在于前者的表层义。刘绍攽曾直言:“《诗》中‘淫诗’太多,余目击后生小子辄谓‘诗以言情’……未必非说诗者貽之害也。”《诗经》中所存“淫诗”之多,不仅削弱了诗教化人之用,同时还使得受到《诗经》垂范的诗歌这一文体偏倾“言情”,而怠忽其“言志”的本质。显然刘绍攽认为从《诗经》这一文献发展而来的诗歌这一文体,其所言之“情”是君子“欢愉悲愤之情思感于中”的情感冲动,而“志”才是诗之本质,是发挥“陶性情,劝善恶”诗教的根本。“以三百篇忠孝至性之发,视为风花月露、吟啸咏游之具”,则是“溺于词华,昧于大义”^{[5]298}。故而刘绍攽认为只有破开“词华”之浮薄,超越字义训诂的视域,援引历史的真实语境才能感发人心,以抵达《诗》之大义。“比

事以观,可为淫乱者之戒”,诗歌中的指涉对象如果过于泛化,则不如引入历史实事、直指人事更能够起到惩创启智的功用。

四、结 语

刘绍攸继承了朱熹对“思无邪”的注解,诗教的教化范围破除了内容“雅正”的限制,“邪秽”之诗同样也有教人化俗的作用。这样一来,解放了诗教的教化范围也就意味着强化了诗教的教化作用。

一方面,在肯定诗歌文学特质的前提下,刘绍攸与朱熹都认为诗本义应当通过反复吟咏、体濡的方式来领会。但这种求诗本义的方式与个人经验和情感接受有着紧密联系,刘绍攸在进行私人化的吟咏体濡之后就屡屡提及“辞气”“词意”来否定朱子之解。另一方面,朱子对“思无邪”的阐释有一定矛盾,读者并非生来就有“无邪之思”,这需要后天的归化与引导。刘绍攸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认为“淫诗”之多反致“导欲”,故而 he 修正了朱子“淫诗”的数量,仅留一两首来达到“圣人垂戒一二”的目的。由于私人化体认方式带有的不确定性与诗歌这一文体所具有的文本空白,《诗经》的文本表层历来众说纷纭,而在认识到诗歌的文体特征之后,刘绍攸选择复归到了汉儒“以事证诗”的诠释传统,通过赋予《诗经》具体的历史语境,不仅能让聚讼纷纭的文本表层具有稳定、具体的含义,同时将《诗》与《春秋》并举,以历史的纵深再次强化了《诗经》的教化作用。

刘绍攸解《诗》以儒家诗教为经,以中和汉宋众说为纬,不以汉宋门户薄屈一家,唯以务实求真为是。他以儒家诗教传统贯之始终,因此其论说出入汉宋诸家,但没有陷入“汉宋之争”的泥淖之中;兼采汉宋也并非亦步亦趋,而是有自己的灼见覃思,这在兴起以“汉”反“宋”学术潮流的清中期大背景下是较为可贵的。同时,刘绍攸多据《仪礼》《说文》《尔雅》等来推阐礼制、音义和名物,并考证国风中州府辖域与地理变迁,隐然有后学乾嘉考据之先声。刘绍攸通过训明音义、析清章句来达到对《诗经》文本的确要诠释,最终实现诗教化俗育人的目的,将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打通关隘,在一定程度

上能祛蔽汉学沉溺故纸之失与明末以来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弊。

参 考 文 献

- [1] 刘绍攸. 学韵纪要[M]//谭湘衡,冯阳,点校. 贾三强,审校. 贾三强. 陕西古代文献集成:第三十一辑. 西安: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23.
- [2] 浩小艳,冯阳. 刘绍攸《经余集》诗歌美学特征刍议[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8(2): 95-100.
- [3] 刘绍攸. 四书章句凝道录[M]//冯阳,浩小艳,胡可,点校. 贾三强,审校. 贾三强. 陕西古代文献集成:第三十二辑. 西安: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23.
- [4] 刘绍攸. 诗逆志[M]. 陕西省图书馆藏清乾隆稿本.
- [5] 刘绍攸. 九畹古文[M]//冯阳,徐来祺,李茹琳,点校. 贾三强,审校. 贾三强. 陕西古代文献集成:第四十辑. 西安: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23.
- [6]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7] 朱熹,注. 诗集传[M]. 王华宝,整理.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 [8] 毛亨,传. 郑玄,笺. 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M]. 龚抗云,等,整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9] 吕祖谦. 吕氏家塾读诗记[M]. 钦定四库全书本.
- [10] 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朱子全书:第二十三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 [11] 杨伯峻. 论语译注:简体字本[M]. 2版. 北京:中华书局,2017.
- [12] 王文锦. 礼记译解[M]. 2版. 北京:中华书局,2016.
- [13] 司马迁. 史记:全本 全注 全译[M]. 北京:中华书局,2013.
- [14] 荀子. 荀子[M]. 2版. 安继民,注译.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 [15] 国语[M]. 陈桐生,译. 北京:中华书局,2014.
- [16] 马端临. 文献通考[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7] 邓秉元. 孟子章句讲疏[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 [18] 左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 [19] 戴震. 戴东原集[M]. 清乾隆五十七年段玉裁刻本.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Liu Shaoban's Thought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ZHANG Yu-jing, FENG Yang

(School of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Law,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Liu Shaoban's *Shi Nizhi* is his main work on his study of *the Book of Songs*, which focuses o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al poetry education of "cultivating temperament and persuading good and evil" and integrates the schools of thought of the Han and Song Dynasties. Citing the commentary of the school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book reflects the cautious attitude of both the Han and Song schools. At the same time, Liu uses exegetical sounds and meanings to interpret the text meaning, and to explore the profound purport of Confucius through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historical facts and the explanation of sound arguments. Deepening the social func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in cultivating people and transforming traditions by a dual study of both textu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would to some extent break down the biased understanding that *the Book of Songs* is either "Han" or "Song".

Key words: Liu Shaoban; the study of *the Book of Songs*; *Shi Nizhi*

【编辑 王思齐】

(上接第59页)

Research Path of Regional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al Theory and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ext Translation

YANG Si-ran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actively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system for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in China, the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and characteristic theoretical study of regional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at a provincial level to provide regional basic support. It discusses the research path and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translation from architectural works to architectural theories. By means of the research techniques of micro-historiography, narrative path, hermeneutics and iconography, an in-depth and characteristic research path is formed to study the literal text, the architectural works and the architectural concepts and to clarify the hermeneutic and iconographic basis of translation from architectural works to architectural theories. It is indicated tha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ree aspects in the translation such as the interpreting diversity of architectural graphic texts, the difference possible between object interpretation of image text and the subject informat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mode of architectural theory that takes text as the main and images as the auxiliary. The paper is to clarify the research path for the study of regional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al theory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and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ranslation.

Key words: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theory; regional; research path; text translation

【编辑 高婉炯】

注释:

①据朱熹《诗集传》所载,除《东门之墀》外,还有《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采芣》《狡童》《褰裳》《丰》《风雨》《子衿》《扬之水》《野有蔓草》《溱洧》,总计十四首。

②据朱熹《诗集传》所载,共有《叔于田》《大叔于田》《清人》三首。其中《叔于田》一篇,朱熹谓“或疑此亦民间男女相悦之词”,另备一说。